

少年时,住在南通仓巷,房东程广发须髯全白,天井里种了许多绣球花。某天进园看花,茶几上见一本老版《辞海》,略翻几页,惊叹天地间居然有如此知识丰博的大书。仅仅惊羡,小孩不敢借。此我知有《辞海》之始。

1978年春,我在校工农兵学员二年级生的身份报考研究生,专业是中国文学史,但专业课还没开设。我的备考办法,一是将当时能借出的各种文学史放在一起比读,二是读刚出的《辞海·文学分册》,后者所涉的知识点,远比各种文学史为多。幸运考到专业第一,改变人生轨迹。《辞海》分科分册可以说是各学科的入门指南,后来得闲,读过不少。

1985年,《辞海》1989年版修订开始。承分科主编章培恒先生看得起,让我负责唐宋部分,总数大约1500条。《辞海》编辑部对修订之态度极其庄重,将档案所存之历次修改文本都交作者参考,因得知文本演进的过程,也发现时代原因,前辈做事都小心翼翼,或仅改些虚字标点,且特别希冀表达立场正确。

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繁荣,使那一版的总体学术水平得到大幅提升,我负责部分也是如此。所记得者,如文言笔记的修订,参考了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和程毅中《古小说简目》,特意增加《异闻集》与《丽情集》条目,表彰二书在唐宋传奇史上的核心地位。唐宋诗人词人部分,吸取那时最前沿的成果,夏承焘到傅璇琮都有参取。八仙部分,充分利用浦江清《八仙考》的成绩,其后的推进也陆续有所补充。最近几十年新见文献数量巨大,但达到在《辞海》中立条目者并不多,比方唐人别集,有几次大的发现,《张承吉文集》值得立新条,王绩、张说别集

濠上漫与

我作《辞海》修订

■陈尚君



1981年版《辞海·文学分册》与1989年版《辞海》(三卷本)。

足本之发现,则补充内容就可以。唐一流诗人,十多年前发现韦应物、姚合墓志,在最后定稿之际补充了新内容。李益墓志发表已来不及,2019版会反映。

《辞海》遇到学术评价分歧、记载难作判断者,是对执笔者学力的严峻考验。比方《全唐诗话》,旧版似说为南宋尤袤编,汇聚唐诗诗事,为唐诗研究重要参考书。我则将其改为:“此书旧时流传颇广,但实为抄窃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而成。原序不署名,仅云‘咸淳辛未重阳日遂初堂书’。宋周密谓贾似道作。明清刻本皆题尤袤作,实出附会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谓出贾似道门客廖莹中之手。清尤侗、近人丁福保疑为尤袤孙尤煊所编。”完全改变旧说。此书六卷,曾收入《历代诗话》,读者很多。持与《唐诗纪事》一比较,不难发现全部属于摘抄,余嘉锡做过比读,我

也曾逐条复核。《唐诗纪事》全书具在,一般读者可以随便看,专业学者则应严格区分。此书作者为谁,历代聚讼纷纭,我希望能准确而有区别地加以表达,首先说明原序后之题署,即作者留下的唯一线索。对主要的四说,则指出贾著为周密一家之言,尤袤断出误说,廖莹中、尤煊二说均出推测,难以定论。叙述分寸拿捏,是合适的。

前人强调一家之言与学术共识之分寸,我十分赞同,总希望严格把握。在涉及自己研究所见时,尤宜谨慎取舍。温庭筠生卒年,旧稿取夏承焘《唐宋词人年谱·温飞卿系年》的说法,标识为约812-约870。到1989年版,改为?-866。卒年改动的依据,一是确认夏说认为温870年还可能在世的南诏侵成都事件,应该发生在828年,二是施蛰存从南宋石刻记录中发现866年温的墓志的记

录。卒年可以得到确认。生年考证唯一线索是《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》诗中,叙述与李年龄之差异及叩见时间。夏先生认为李是李德裕,更倒推温生于812年前后。我在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1第二期刊文《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》,认为李是李绅,推温生于801年前后。当时我认为,新说似乎还不能完全作定论,但夏说之误则可确定,因而将生年空缺。后来因张以仁、刘学锴等前辈皆表态支持拙说,方改为约801年生。类似的情况还有《二十四诗品》是否司空图作,因我与汪涌豪1994年刊文断其非司空图作,引起广泛争议,支持与反对者都很多,最近20年古籍检索的普及更有力支持了我们的推测。但若我因修订《辞海》武断判定是书为伪,总有公器私用的嫌疑。从1999年版开始,我将该条第一句作者归属的话改为“旧题唐司空图撰”,既表达客观事实,也提醒读者此处有疑问,但仍难作结论。当然可作结论还应勇于断决。《本事诗》作者是孟棨还是孟启,记载有歧,《四库提要》说“诸家称引,并作棨字”,是纪昀的臆断。近几十年内山知也调查《本事诗》所有传世文本都署孟启,王梦鸥证明孟启字初中,名、字恰相应,洛阳已经发现三处孟启的签名石刻,证据足够定讞。我于2009版《辞海》定稿前,请编辑部将全书《本事诗》作者部分都改为孟启,幸获接纳。

当然也会有特殊情况。朱东

润师知道我参与《辞海》修订,问我:“《辞海》怎么可以没有唐文治先生呢?”后来读师自传,知他曾与鲍正鹄先生为此给编辑部写信,未获允准。我请示分科主编,章先生说你可先写出来。我仍联系鲍先生,鲍请苏州大学校史馆提供资料,写成初稿。

《辞海》始终坚持在世之人不立条目,成为公识。最初似乎在世人名也尽量不提。比如李白、韩愈有今人注本,只说“今人有校注本”、“今人有编年集释本”,不提谁做。李庆甲先生是1985年去世的,1989年版《瀛奎律髓》条,仅仅讲“今人有汇评本”,后来才将名字补出。但有时仍很难。比如《全宋词》,是基本典籍,那时唐圭璋先生还在世,经请示后同意出书名条目。近年稍微放宽一些,有学术定评之专书,和古籍条目下所涉今人笺注本有客观介绍,对读者是有用的。

1989版《辞海》,唐宋文学部分修订费时在半年以上。此后几次费时没有这么多,因所涉问题已熟悉,且有长期关注积累。对我来说,修订《辞海》付出虽多,但收获也不少:一、熟悉了辞书语言的表达,省略主语,高度浓缩,拿捏分寸,遣辞规范,得到严格训练。其后为各种辞书撰稿约一万条,得心应手。二、了解到任何复杂的学术问题,都可以浓缩在百把字中作最稳当的表述。前几年流行微博,写了许多,在140字的限制中说了许多事情。三、培养全方位关心学术动态的习惯,知道轻重缓急,也理解学术研究中不足立说、可备一说、接近成立以及确凿不移之程度,学会了复杂争议中稳妥取舍的办法。前辈常讲,年轻人喜欢把话讲满,足见学术不成熟,成熟的标识是知道把握分寸。对此,我是逐渐体会到的。

(上接第一版)

他的讲课内容,也是与众不同,一般来说,讲先秦文学史,总是从神话歌谣讲起,历经诸子散文、历史散文、诗经,到楚辞结束。章先生却是独辟蹊径,不讲别的,只讲楚辞。他的观点很明确,与其面面俱到地泛泛而讲学生都能看懂的教材上的内容,还不如把自己对一两个问题的研究讲深讲透,学生们可以从中学到研究问题的方法,而这正是大学和中学教学的根本区别。

在章先生的这门课上,我第一次听说了学术界对中国历史上有无屈原这个人物的争议,详细了解了双方的观点,也聆听了章先生自己的看法。我也第一次学习了屈原名下25篇作品真伪问题令人信服的考证,知道了屈原的绝笔应是“怀沙”而不是通常认为的“哀郢”。的确,这些内容在“泛泛”的文学史课堂上是绝对听不到的。

“逃离”章先生

世事真是难料,我留校后所遭受的第一次打击竟是来自我所敬仰的章先生。

1984年,编完了《今日汉语》教材,按事先的约定,我是应该回古典文学教研室了,于是我向当时的系总支书记徐俊西先生提出了请求。想不到没过几天,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王水照先生来找我,带着祝贺的口吻告诉我,章先生有让我去他新组建的古籍所的意思。对这个问题我一点思

想准备都没有,心里非常的矛盾,被章先生看中,固然是一种光荣,但当时家庭的一些情况又不允许我天天去古籍所坐班,所以最后还是婉拒了章先生的美意。

这自然引起了章先生极大的不快,我立马便感受到了来自章先生的压力。首先,系里取消了我随蒋天枢先生读两年书的计划,理由是蒋先生年纪大了。其次,指派了另一位学术上并无建树的先生做我的指导老师。我切实地感受到了被边缘化的危险,于是决定“逃离”章先生。当时正好在留学生部教外国学生的江巨荣先生想回中文系,于是我很快地和他办妥了对调手续。

留学生部后来变成了国际文化交流学院,我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年。这十年中,我和章先生完完全全是“老死不相往来”的,当然,对于章先生这样的大名人,我是一直很关注的。没想到的是,章先生对我也是有点在意,有件事说明了这一点。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,有一天,当时在章先生手下工作的邵毅平悄悄地告诉我,说章先生要他向我学习,我惊讶地问他向我学什么,他说章先生没说。看来,这件事究竟所指为何只好永远存疑了。

“平交”章先生

我与章先生的关系出现转机,是在1994年我回到中文系之后。有一次骆玉明专程来找我,说章先生有好几次说起我,

说我多年来对陈允吉先生谨执弟子之礼的做法,是一种良好品格的表现。玉明兄明示我要抓住这个契机。在他的鼓励下,我斗胆地敲开了章先生的家门,这是我第一次与章先生面对面地交谈。我能感觉到,那天章先生非常高兴,他向我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想法,就是打算重写刚刚出版不久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他的理由是,那本书对用人性审视文学的主旨体现不够,对作品的分析也不到位。过后不久,果然掀起了重写刚出版的文学史的轩然大波。

我和章先生的关系“正常化”了,但远非达到亲密的程度。在以后的日子里,我好几次去过他的家,也吃过好几次他的饭,但都是和吴中杰先生夫妇一起去、一起吃的。其间只有三件事情忘不了:

第一件事情,是章先生为我给中学生上课。当时我在闸北的和田中学有个教学培训点,那里的校长希望我能够请到章先生为他们的学生讲一次课,对能不能请动章先生,我是绝对没有把握的。想不到他欣然答应,那天我去接他,一路上他兴致很高,跟我说了好多事情,比如对复旦牵头成立宋代文学学会的看法等等。使我很过意不去的是,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有点不适,准备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了,却还是接受了我请他为中学生上课的请求。

第二件事情,他与陈允吉先生由误会引起的不快已经多年,我感觉到两位老师消除误会重归于好不是没有可能,于是斗胆做东,三个人一起吃了一顿饭,当时的



章培恒先生

效果还是不错的。两位老师能够买我这个后生的薄面,着实使我感动不已。

第三件事情,有一天,章先生突然打电话给我,说北京的陈四益先生来了,他请客,让我作陪。我去了,见吴中杰先生也在,就四个人。我和陈四益素昧平生,绝无渊源,只知道他与画家丁聪合作,在报刊上写过很多小品。章先生那天为什么请我作陪,我也是至今猜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我和章先生见的最后一面,是在他的安波路寓所,当时章先生患癌症已有一段日子,那天是吴中杰先生带我去的,刚好黄霖先生也在,大家谈得还是蛮开心的,章先生还把他在服用的“五味汤”介绍给大家。

后来,听说章先生病重了,想去看他,却被告知,章先生不再见客。不久,就听到了章先生去世的消息。追悼会那天,我刚好不在上海,但心里还是凄凄凉凉的。